

# 儒学当代复兴及其路向

蒋国保

(苏州大学 哲学系 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 在当下,如何谋求儒学复兴?学者们提出了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三种儒学当代发展路向。本文通过对儒学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提出了与这三种路向不同的另一种儒学当代(当下生活的时代)发展路向,即“世俗儒学”的路向。“世俗儒学”也就是使儒学世俗化,不是要使儒学庸俗化,让儒学变得容易迎合民众的庸俗要求,而是要让儒学“祛魅”,清除儒学精神贵族化——以儒学为“生民立命”、以儒学救人类、以儒学代表人类文化未来——的倾向,将儒学化为民众世俗生活的精神导向。为谋求儒学世俗化,本文提出儒学当下迫切需要三大转变,即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问题。

**关键词:** 儒学;现代;当代;复兴;世俗儒学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3)01-0042-07

## The Revival and Orient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the Contemporary Area

JIANG Guoba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China)

**Abstract:** How to revive the Confucianism at present? Scholars have proposed three orientations for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daily life. This paper proposes a different orientation, namely the orientation of “Secular Confucianism”. It secularizes the Confucianism instead of vulgarizing it. We should not make Confucianism easy to cater to people’s vulgar requests, but let Confucianism get rid of ghosts, and clear away the spiritually aristocratic aspect of Confucianism, tending to take the Confucianism as a means of securing life and fortune for the common people, saving the mankind and representing the future of human culture. We should make Confucianism become the spiritual guidance of people’s secular life. In order to seek the secularization of Confucianism,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urgent changes, namely the change of position from paying attention to intellectuals to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mmon people”; the change of attitude from rejecting secular values to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worldly aspirations and the secular requirements of the people; the change of orientation from focusing on positive living guidance to actively concerning about the negative issues in life.

**Key words:** Confucianism; modern; contemporary; revival; secular Confucianism

“现代”与“当代”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modern)。我之所以不用“儒学现代复兴”提法而用“儒学

收稿日期: 2012-12-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儒学的当代困境与未来发展研究”(编号: 02JA720013)

作者简介: 蒋国保(1951-),男,安徽无为县人,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儒家文化和儒家哲学研究。

当代复兴”提法,乃基于以下认识:儒学的现代复兴,或曰儒学的现代化,是针对儒学之古代存在样态而言的。在儒学之古代存在样态未“化”为现代存在样态之前,亦即儒学未实现现代化之前,儒学的当代复兴,也就是儒学的现代复兴。但就“当代”乃“当下生活的时代”这个意义上讲,儒学的当代复兴,并不等于儒学的现代复兴,因为相对于儒学现代复兴意味着儒学现代化的实现来说,它又只是儒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它的结局。近现代以来,中国一代代学人,不止一次地倡导并推动“儒学的当代复兴”,但迄今儒学并没有实现现代化,得以真正复兴。有鉴于此,本文希望通过总结儒学现代复兴的历史经验,以回答儒学何以迄今未能复兴的原因,并据之以探讨以下问题:为了推动儒学的现代复兴,生活在当下的儒家、儒学从业者及认同儒学的各界学人,当提倡并坚持怎样的儒学现代发展路向。

—

“复兴”是指恢复、回归曾经有过的兴盛和辉煌。讲儒学复兴,就不能不讲儒学曾经有过的兴盛和辉煌。儒学的兴盛和辉煌,出现在先秦、两汉时代。但先秦时代的儒学之兴盛与辉煌,同两汉时代的儒学之兴盛和辉煌,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不能混为一谈。

先秦时代的儒学,称为原始儒学,是由孔子创立,为曾子子思孟子荀子所推进与发展的原创性儒学<sup>①</sup>。原始儒学,不但径直面对现世人类来回答人的存在问题,而且其回答力求“明于天人之分”<sup>②</sup>,决不将人之存在问题之解决归诸上帝(天)的神力,而寄托于人自身的能力。就这个意义上讲,原始儒学真正是“人学”,它始终围绕着“人”自身作文章,以关注“人”为思想的起点,以解决“人”的实际问题为思想的方向,以遵从道德为思想的准则,以推崇君子圣贤为思想的境界。对于“人”的专注,使原始儒学在思想上排斥宗教的、政治的思想发展方向,将儒家思想之创立与发展,规约在人文主义范畴之内;注重解决人的实际问题,使原始儒学排斥虚幻的、理想的思想发展方向,将儒家思想之创立与发展,奠定在世俗情怀上,承认“形色,性也”<sup>③</sup>,肯定人“欲”的合理性<sup>④</sup>,予民众的世俗欲望、世俗要求、世俗理想以同情的理解,决不轻视人的感性存在意义;遵从道德准则,使原始儒学在思想上排斥知识理性的思想发展方向,将儒家思想之创立与发展,植根于实践理性之上,以“道德优先主义”行事,强调“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sup>⑤</sup>,不但认为解决事情必须依据道德,而且以为事情之解决的合法性的根据是道德、事情之解决的有效性的保证是道德,道德原则是至上的原则,非其它任何思想原则所能替代的;推崇君子圣贤,使原始儒学在思想上排斥平庸低俗的的思想发展方向,将儒家思想之创立与发展,安立在崇高的道义追求之上,铁肩担道义,肝胆写春秋,将人的生命置于崇高的理想境界,坚信圣人与普通人平等的存在意义,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sup>⑥</sup>,始终以成就理想人格为期许,以抵制与排除伪善和低俗的人生态度对人的生命精神的戕害。

原始儒学既然如此重视人、人的问题以及人的问题之解决之道,则它能发挥收拾人心的巨大精神作用,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孔子在春秋战国时代被视为“木铎”,儒学在春秋战国时代被称为“显学”,正足以说明原始儒学实际上不但具有这一作用,也真的发挥了这一作用。但是,春秋战国是个崇尚“霸道”的时代,如何有效地争城夺地以成就霸业,是当时各诸侯国莫不祈求(哪怕是幻想)的功利——即价值理想之所在,所以原始儒学所阐述的做人之“道义”被君主们看作“迂阔”而予以拒绝,也就是必然的事。两厢对比,不难明白:原始儒学在先秦固然兴盛与辉煌过,但它不是兴盛和辉煌在上层、在朝廷、在官方,而是兴盛和辉煌在下层,在民间、在大众,一言以蔽之,在普通民众的人心中。

① 相对汉以后经学化的儒学而言。经学化的儒学是以经典解释的方式来表达儒家思想,不是儒家思想的直接创造。

② 《荀子·天论》。

③ 《孟子·尽心上》。

④ 《孟子·尽心下》有云“可欲之谓善。”

⑤ 《孟子·梁惠王上》。

⑥ 《孟子·告子下》。

在两汉时代,儒学也曾兴盛和辉煌过。但与先秦儒学之兴盛与辉煌相比,两汉时代儒学兴盛和辉煌,表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sup>①</sup>,其兴盛与辉煌在于它已成为封建官方哲学,也就是说两汉时代的儒学实际上是兴盛和辉煌在上层、在朝廷、在官方。为了适应这一兴盛和辉煌,护卫其官方哲学的地位,两汉儒家以经学的方式将儒学由“学”变为“术”,把儒家的道德学问改变成服务于政治统治的“方术”学问。为了适应这一改变,两汉儒家先是将阴阳五行学说引入儒学,后是将儒学谶纬化,并制定“师法”与“家法”,严格限定和规范思想传承的学统,以限制儒家思想的自由发展。经过这一改变,孔子由人变成了“神”,儒学由“人学”变成了“神学”,原始儒学(先秦儒学)那种人文情怀、世俗关切的精神薪求丧失殆尽,使儒学失去了收拾民众之心的力量。恰逢此时,印度佛学传入中国。面对佛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作为官方哲学的儒学却无力与其抗衡,起来护卫中国文化传统,使佛学借助道家学说得以迅速地占领了中国人的心灵,成为中国人实际的精神寄托。这种状况在后来的隋唐时代一直持续着,终于导致了唐末五代的全民及全面的“道德沦丧”。

唐末五代的全民及全面的“道德沦丧”,令宋代儒家惊醒,迫使他们思考一个问题:有制度护卫的儒学,为何失去了收拾人心的力量?要使儒学重新发挥收拾人心的作用,使人提升已沦丧的道德,儒学当如何复兴?这一思考,使宋儒在作“尊德性而道问学”<sup>②</sup>的选择时,轻视了“道问学”,而重视了“尊德性”。正因为宋儒侧重从“尊德性”的层面谋求儒学的复兴,他们便刻意改变原始儒家对形而下世界的关注,将眼光转向形而上世界,希望为人找到确保其永讲道德、不使道德沦丧的先天根据。这个眼光势必将宋儒引向形而上的理论建构,用牟宗三的话语说,它必定使宋儒将复兴儒学具体化为为儒学构建一个“道德的形上学”。“道德的形上学”是从道德的路数所确立的哲学本体论,它不是道德的解释学(道德哲学),而是为道德确立先天根据的一种本体论哲学。宋儒的“道德的形上学”为儒学所确立的道德本体,用他们自己的范畴来说,就叫做“天理”(省称“理”)。“天理”既超越又内在。作为超越的存在,它是“无执”,主宰、决定一切物质与精神世界却不为任何现实与可能世界所限制;作为内在存在,它是“有执”,一定依存于物质、精神世界而成为物质、精神世界得以存在的“所以然”。在宋儒中,“心学派”以“心”称谓此“所以然”,强调“心即理”,而“理学派”(狭义)则以“性”称谓此“所以然”,强调“性即理”。“心即理”与“性即理”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心即理)将人的道德本体(本心、良心、良知)直接等同超越的“天理”,以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sup>③</sup>,良心与天理、吾心与宇宙之间并无一个由“性”转向“心”的过程;而另一个(性即理)则以为“天理”作为内在的存在,其普遍性的体现者是“性”,“性”是物与人之存在都具有的存在根据,特意以“心”称之,只是为了凸出人是能动的存在,由道德本体(性,未发)一定会自发地开出道德意识(心,已发),化为道德行为。“心本”与“性本”都归入“理本”。“理本”也就是以“天理”为“本”,将“天理”(理)确立为世界的究极本体,所以宋儒一致以护卫“天理”为己任。

可如何护卫“天理”?他们又一致认为,要护卫“天理”就要“灭人欲”。“灭人欲”对宋儒来说,当然不是为了否定人之生理欲望的合理性,而是为了从价值上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以强调“天理”与“人欲”的不可调和性:存一分天理,灭一分人欲,反之亦然。宋儒将“存天理,灭人欲”<sup>④</sup>作为指导人生的价值导向,强调“灭人欲”就是以“无欲”成就“纯天理而无一丝人欲”<sup>⑤</sup>理想境界。这不但改变了原始儒家的“寡欲”观,而且将人的道德认同与人的生活欲望对立起来,以为人只有在压抑乃至消灭世俗生活欲望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树立其道德。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禁欲主义。佛教的禁欲主义是走向来

① 通常以为此说乃董仲舒于公元 135 年提出,然《汉书·董仲舒》未见此提法,只有“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抑黜百家”的说法。又,有学者认为此提法最早见于易白沙于 1916 年发表在《青年杂志》上的《孔子评说》。

② 《礼记·中庸》。

③ 《陆九渊集》卷三十六。

④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二有云“明天理,灭人欲”;王阳明《传习录》有云“去人欲,存天理。”

⑤ 朱熹《大学章句》有云“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王阳明《传习录》有云“天理人欲不并立。”

生幸福的保证,它是与以现世人生为“苦”、以脱现世之“苦”为救赎、以来生幸福为寄托的信仰相一致的,而儒家本以现世人生为“乐”,以为人当以积极的作为追求现世的幸福,决不能将人的幸福寄托于来世幻想,则宋儒家的变相的禁欲主义(灭人欲),实际上不能将人引向“纯天理”,只能成为扼杀人感性生命的精神枷锁。

## 二

宋儒所确立的“存天理,灭人欲”,后来为元明清儒家所传承,成为新儒家的思想传统。新儒家代代传承并倡导之,使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束缚下,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扭曲,颠倒了生命与价值的关系,以生命博价值,以至于真心认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sup>①</sup>,甘心守贞乃至殉葬。正是因为看透了“存天理,灭人欲”说必然会引导人们走向对感性生命之极度轻视的这一性质,戴震才那样尖锐地批判新儒家,痛斥他们非但是“以理杀人”<sup>②</sup>,而且让人甘心被杀。戴震是一位具有近代启蒙思想倾向的思想家,他对新儒家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讲,昭示了儒学在新儒家(宋元明清儒家)之后当走的发展道路,这就是由形而上世界回归形而下世界,从现世民众的现实生活及生活欲望出发以寻求儒学的近现代发展。但晚清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先是走宗教的路数,希望将儒学变宗教;后是走哲学的路数,希望将儒学不仅当做道德哲学而且当做元哲学,完全未顾及戴震批判新儒家的用心。

康有为及孔教会同仁所倡导与推行的以“孔教为国教”<sup>③</sup>的儒学复兴运动,走的是宗教的路数。而走哲学的路数以求儒学的现代发展者,当数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历了三代九十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自身的派别分化,有主“理本体”的一派,有主“心本体”的一派,有主“生命本体”的一派,但分化并没有消解他们所当有的共通的某些思想倾向。例如他们声称,其所推行的“儒学第三期(原始儒学是第一期、新儒学是第二期)发展,是‘接着宋明讲’”<sup>④</sup>。这也就是说,现代新儒家声称他们在思想传承上的共通点就是循着新儒家所走的哲学路数以推进新儒家哲学思想<sup>⑤</sup>。

循新儒家的路数以推进新儒家思想,照牟宗三的说法,具体是指顺应儒学第二期发展之路数而又弥补其不足。儒学第二期发展,对于儒家精神之发扬来说,贡献在于充分地张扬了由孔孟荀所奠定的儒家道德理性(内圣);但正因为新儒家十分、甚至过分地张扬“内圣”一面,从而遮蔽了对“外王”(知识理性)一面的应有的关注,使儒学第二期发展存在严重不足,即没有开出本应开出的“外王”精神。基于这一认识,牟宗三强调“儒家的当前使命”就是“开新外王”。

对于儒学现代复兴、现代发展来说,“开新外王”才是“正确阐发”,与之相比,其它阐发儒学现代作用与使命——或曰儒学有拯救现代文化危机、道德危机、认同危机、意义危机、存在危机的现实价值与作用;或曰儒学有适应现代文明的崭新的内容;或曰儒学可以为现代人安身立命提供终极关怀;或曰儒学可以为人类现代(当代)乃至将来的新文化建设提供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的见解,都是不足取的,因为这样讲儒学的使命,讲儒学的现代复兴、现代发展,是将儒学的现代使命讲成了“适应”、“凑合”现代化,而儒学的现代使命,决不能这样讲,它应当讲成“‘实现’的问题”,即将儒学的现代使命讲成儒学有实现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儒学“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要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我们说儒家这个学问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地负起它的责任,即是表明从儒家内部的生命中即积极地要求这个东西,而且能促进、实现这个东西,亦即从儒家的‘内在目的’就要发出这个东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有云“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② 戴震《与某书》,见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的《戴震全书》第六册第494页。

③ 陈焕章《向两院请定孔教为国教书》。

④ 冯友兰语。

⑤ 这是就现代新儒家大多数情况而言的,并不是就现代新儒家全体来说的,若就其全体说,当承认亦有例外,例如方东美比较轻视新儒家,故并不主张儒学的现代发展当“接着宋明讲”,而是主张跨过新儒家,直接接着原始儒学讲。

西、要求这个东西。”<sup>①</sup>

“内在要求”说的主旨在于强调必须从儒学内部探讨儒学何以能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从而实现儒学自身的现代发展。就其本质而论,此说当完整地称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内圣”指的是儒家的常道,具体讲就是指以儒家的道德意识、道德理想、道德取向、道德实践为指向的道德理性。“新外王”是指科学与民主。可见,所谓“内圣开出新外王”,是说儒学有开出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要求”,儒家的道德理性可以内在地开出西方的基于知识理性的民主与科学。这种讲法,是对唐君毅的儒学现代发展当“返本开新”说的深入,特别强调儒学的现代发展不关乎“内圣”,只关乎“外王”。换言之,牟宗三的“内在要求”说,主旨在于主张以“守内圣”而“开新外王”的做法以推进儒学的现代发展、完成儒学的现代化、实现儒学的现代使命。

问题是,儒家所谓“内圣外王”,本来讲的是由高度的道德直接开出伟大的王业或事功,按照儒学本来的“道德优先主义”逻辑来理解与把握,这种“直开”是讲得通的,不存在隔阂之处。但如果说“守内圣”而“开新外王”,由于存在着古代的道德理性与近现代的知识理性的冲突,两者之间势必存在隔阂,那么就不可能在坚守“内圣”不变的前提下由“内圣”直接开出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牟宗三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强调“内圣开出新外王”,不是“直开”,而是曲折的开出。这其中要求“内圣”方面有一个“辩证的开显”。如何能“辩证的开显”?因为决定“内圣”的“良知”(道德本体)可以“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良知自我坎陷”说固然一定程度地回答了“内圣”何以能“曲开”(“辩证的开显”)问题,但也留下一个更加难解的问题:什么力量决定了良知——道德本体——必然自己否定自己?牟宗三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好搪塞说,“良知坎陷”就好比“平地起土堆”<sup>②</sup>。“平地起土堆”乃带有神秘主义意味的说法,以之作为自己论断的理论根据,背离了现代新儒家所崇尚的理性精神,反映了牟宗三学说在内在理路上的不周全。

牟宗三关于儒学之现代发展、现代复兴、现代使命的论说,在现代新儒家中,是最系统、最深刻的,与之相比,诸如梁漱溟的“意欲三路向”说、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转换”说、唐君毅的“返本开新”说、方东美的“生命提升”说等,都显得不那么系统与深刻。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就这里所谈的问题来说,这一差异并不具有根本意义,对这里所谈的问题具有根本意义者,反倒是他们的相同、相通处,即他们都无例外地引西学入儒学,以西方哲学的理念、方法、模式解释、架构儒学,并坚信通过这番改造,融西学于儒学,使儒学理性化、体系化,儒学就能发挥现代作用,完成现代使命,实现现代复兴。当他们为自己的这一信念不懈陈辞时,他们根本不去想一个他们本应该思考的问题——“良知坎陷”似的儒学理性化、体系化,又如何使儒学贴近现代民众的世俗生活、赢得现代民众的情感认同?如果不能赢得现代民众的情感认同,儒学的现代作用又如何得以发挥?儒学的现代作用如不能发挥,儒学又何以完成现代使命,实现现代复兴?

### 三

回顾儒学复兴的历史,总结其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现代新儒家谋求儒学现代化之得与失,对我们当下谋求儒学的健康发展能有怎样的启示呢?这个启示就是,当下的儒学复兴,或者说儒学现代化,当避免走宗教的路子、哲学的路子,消除制度儒学、形上儒学、架构儒学的影响,直接“返本”,坚持走生活的路子,接着原始儒学讲,以恢复儒学在先秦时代那样的“显学”地位——未必非得当官方哲学,只求兴盛于民间,真正得民心,真正能收拢民心。当前在国内,有提倡“政治儒学”者,有提倡宗教儒学(以儒学为宗教)者,有提倡生活儒学者。与之相比,我之“接着原始儒学讲”的儒学现代发展的主张,既不同于“政治儒学”的主张,也不同于“宗教儒学”的主张,而且与“生活儒学”的主张也不完全相同。也就是

<sup>①</sup> 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见《中国文化论文集》(二)第4页,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出版。

<sup>②</sup> 以上均引自《现代新儒家学案》(下)第450—4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说,我认同当代发展儒学当走“生活的路子”而不能走宗教的、哲学的超越的路子这一主张,但在如何走“生活的路子”以发展儒学问题上,我有自己的看法。在认识上与主“生活儒学”者有明显的差别,并不完全相同。下面就此简单地谈谈我的认识。

从汉唐儒家将儒学“术”化(以适应作为官方哲学的政治需要)所造成的儒学生存危机——使儒家精神失去了高度,无力与佛道二学争夺人心——来看,儒学得不到某种政治制度的护卫,与儒学能不能深入人心,不构成因果性的必然关系。由此可以推想,那种政治儒学(制度儒学)的构想(如何使儒学在当代重新作为官方哲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非但不切实际,也不能保证儒学在当代必能赢得人心。这也就是说,政治儒学(制度儒学)的构想,不是当下推动儒学复兴所当取的路向;

从宋元明清新儒家、现代新儒家将儒学形而上化所造成的儒学生存危机(使儒学变得玄秘,从而使民众疏离儒学)来看,儒学要被民众所接受,深入人心,不是将儒学逻辑化、体系化、精致化所能奏效的。岂止是不能奏效,将儒学逻辑化、体系化、精致化甚至加深了儒学与民众的疏离,令民众接受儒学变得更为困难。例如,新儒家讲“天地万物一体之仁”<sup>①</sup>,民众理解起来已很困难,现代新儒家再接着讲“良知坎陷”,民众就更不可能理解。理解的不一定必接受,接受的必定已理解<sup>②</sup>。连理解都做不到,民众又怎么能做到真的接受、认同儒学。由此也不难推断,傅伟勋所谓儒学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沿着牟宗三的路数”推进牟宗三哲学的构想,也是当下推动儒学复兴所不当取的。推而广之,无论是“接着宋明讲”还是接着现代新儒家讲,对于当代的儒学复兴来说,都是不当取的。

制度儒学、宗教儒学的路子不足取,这就意味着当下发展儒学当走“生活儒学”的路子。就我所掌握的信息而论,国内学者所讲的“生活儒学”,不外乎两种讲法,一种讲法是讲儒学如果是一种哲学的话,那么它只能是“生活哲学”,是走“生活的路数”所建构起来的哲学;另一种讲法是讲儒学在失去了制度护卫的背景下,要求得生存与发展,只能直接面对民众的生活以发挥指导民众生活的作用。这两种讲法,对于我们认识儒学的性质,正确地推动儒学当代复兴,是十分有益的启迪,但这两种讲法都是设想儒学只要发挥作用,真正影响民众(无论是影响其心灵还是影响其生活),儒学就得以复兴,并没有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民众疏离、冷漠乃至拒斥儒学——这意味着儒学即便有收拾人心的作用,也未必真能收拾民心——的背景下,儒学如何有可能发挥其安抚民心、指导民众生活的现实作用。也许有学者要说,这是个杞人忧天似的问题,殊不知儒学是中华文化的命脉,只要是华人就没有理由拒绝儒学,自然会基于其生命的需要认同儒学。这充其量只是个机智的辩解,无益于该问题的解答,因为我们很容易反驳说:既然华人基于其中国文化的情怀自然会认同儒学,那么儒学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民众所疏离,发生存在危机。由此看来,儒学要在当下发挥其收拾民心的作用,消解其存在危机,决不能迷失于幻想或空想,当另寻现实可靠的途径。

这个途径,在我看来,就是通过儒学世俗化以实现儒学的大众化、普世化,使儒学的普世价值得以发挥作用。世俗化是手段,大众化是途径,普世化是目的。没有儒学的世俗化,儒学的大众化就无从谈起,而没有儒学的大众化,儒学的普世化就无从实现,因为如没有儒学的大众化,儒学的影响就只能局限于特定的阶层,比方说知识分子阶层,却难以影响广大的民众,儒学的普世价值因而也就不能体现;而儒学的普世价值如不能体现,则儒学世俗化就无必要。由此可见,儒学的世俗化,是儒学大众化、儒学普世化的前提,是当下复兴儒学当首先考虑的问题。

那么,儒学的世俗化是什么意思?儒学的世俗化不是要使儒学庸俗化,让儒学变得容易迎合民众的庸俗要求,而是要让儒学“祛魅”,清除儒学精神贵族化——以儒学为“生民立命”、以儒学救人类、以儒学代表人类文化未来——的倾向,将儒学“化”为民众世俗生活的精神导向以及民众世俗情感、世俗理

<sup>①</sup> 《王阳明全集》上第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sup>②</sup> 理解的要接受,不理解的要接受,属于另一个问题——因外力而被迫接受,非出于自觉的真诚接受。而儒学的出路,必须建立在民众真诚地接受之,进而转化为自己人生的价值认同。

想的寄托。为了实现儒学的世俗化,儒学的当下发展,迫切需要三大转变。关于这三大转向,早在十几年前,我就有所论述<sup>①</sup>,现转述在下<sup>②</sup>:

(1) 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儒学本为“士”学,重视以“士”的道德榜样的影响来营造全社会讲道德、守伦理的风气,是儒家的一贯的立场。在“四民士为首”的古代,儒家坚持这一立场,对于推行儒学、以儒学把握人心来说,未必不可行。但在当下社会里,希望通过知识分子(士)的榜样影响使普通民众真诚地认同儒学,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已失去了作为社会榜样的身份。这就决定了如果继续坚持重“士”的立场,儒学就会走上绝路。只有转变立场,变重“士”为重“民”,儒学才能走上生路。以“民”为重,儒学就要改变对民众的态度,不能以“民”的教主身份来教训“民”,要外敛强人之威势、内显淑民之心态,予现代民众的生活方式、世俗情怀、世俗欲望以及世俗观念、世俗理想以同情的理解。要同情地理解民众的言行,儒家就要认识到,民众接受不接受、认同不认同儒学,是个认识问题、是个情感问题,而不是人生价值问题。你不能将认同不认同儒学同人生境界高低划等号,更无权因民众不欣赏、不接受、不认同儒学而贬低民众的生命价值、人生境界。如果儒家硬要这么做,那只能伤害民众的情感,不啻强迫民众与儒学保持距离;

(2) 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儒学本来强调“道德优先”,以为道德不但是一切事情得以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做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要预定的行为原则。这对儒家来说,就是按“经”行事,是不能改变的。但在现代社会里,讲求的是效率、实效和利益,“道德优先”主义已失去市场,再一味地坚持儒家常道不变,任何时候都强调守“经”以制“权”、依“经”以行“权”,那么势必不能容忍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最终会因失去“权”(即灵活地对待与处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而导致守不住“经”的结局。问题是,儒家如何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这当然要首先关切民众的世俗要求。而关切民众的世俗要求,可以从两方面把握,积极方面在于儒家当彻底放弃精神贵族化倾向,以力求精神上的世俗化——即将生命精神薪向由追求超越的形上世界转向世俗的形下世界,在价值观上正面肯定世俗价值的正当性、合理性、积极性;消极方面在于力图避免将儒学庸俗化。要避免将儒学庸俗化,儒家首先要明白,儒学世俗化固然有投民所好之嫌疑,但投民所好只是方便行“权”之手段,并不是目的。就目的讲,儒学世俗化并不是为了将儒学变成论证民众庸俗趣味、庸俗言行之合理性的学问,而是为了强调:只有主动地适应现代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投民众所好,儒学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因为现代社会毕竟功利主义盛行,民众普遍认同世俗价值;

(3) 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问题。儒学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其显著的特征,就是专注于从正面指导人生,要人们相信:堂堂正正做人、积极勤奋做事,是人的本分,亦是人实现人生价值之所在;而缺乏对负面人生应有的关注,从未告诉人们人生困惑、人生苦难、人生丑恶何以有以及如何认识、怎样消除。由于儒学具有这样的特性,儒学就很难取得现代民众的认同,因为现代民众的积极人生,是靠现代价值观念来支撑与维系的,不是其他价值观念所能左右的。由于现代价值观念往往不能满足现代民众渴望消除人生困境的强烈愿望,所以现代民众又迫切地希望能找到一种能揭示其人生负面之真相的学说,以解答其人生困惑。能起到这个作用的学说,是佛道二学以及基督教哲学,唯独不是儒学,因为儒学的严重缺陷正在于对人及人生的负面缺乏起码的了解与应有的关注。由此不难推断,在现代文化背景下,儒学假如不正视现代民众消极的人生要求、不认真解决现代民众种种人生困惑,则不足以与专以解答人生困惑、解脱人生苦难的佛教或基督教抗衡,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起到指导现代民众精神生活的作用。儒学若不能全面地指导现代民众的精神生活,则儒学要求得当代发展、实现现代复兴(儒学现代化)便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成为空想。

(责任编辑:余小江)

<sup>①</sup> 参见拙作《儒学的现代困境与未来发展》,收入《儒学与廿一世纪》上,华夏出版社,1996年。

<sup>②</sup> 需要声明的是,这不是一字不改的照搬,而是在不变观点的前提下,改动了大量的文字。